

从英汉习语的互译谈翻译中的可译和不可译

张永萍 娄瑞娟

(北京林业大学外语学院 北京 100083)

【内容摘要】可译性和不可译性是翻译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翻译界争论已久的焦点之一。翻译中绝对的可译性和绝对的不可译性论断都有极端主义的趋向。没有绝对的可译,也没有绝对的不可译,二者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只不过是一个程度问题。本文在拥有固定表达形式和蕴含丰富民族文化的英汉习语互译的基础上探讨了翻译中的可译性和不可译性问题,语言的不可译和文化的不可译。认为从语言和文化整体层面而言,翻译是可能的。然而,由于不同语言音、词、结构、语法等方面的差异造成的一些音律、字形结构、修辞、风格等方面的相对不可译现象在目前是很难改变的,文化层面即使有些难译和暂时的不可译现象,也会随着翻译方法的不断探索更新、日益频繁的跨文化交流和人们心理开放度和接受度的增加而变得易译和可译。

【关键词】可译性和不可译性 语言的可译性 文化的可译性 英汉谚语 互译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10)11-0171-05

可译性和不可译性是翻译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翻译界争论已久的焦点之一。在其发展早期,争论主要集中于可译还是不可译,随其发展至今更多集中于可译和不可译的程度问题。各派各家的观点不一,有人二元对立地将其分为相对的不可译和绝对的不可译,如王宾通过《静夜思》的个案分析论证了绝对不可译性的存在^[1]。有人将其分为可译性、相对不可译性和绝对不可译性(刘传殊)^[2]。包惠南、包昂按限度将其分为语言结构(音律美感、字形结构、修辞手法、语言风格)的可译性限度和文化(物质文化、观念文化、习俗文化、地域文化)的可译性限度^[3]。萨格尔(Sager)将翻译中出现的困难分为四类:“语用翻译问题、跨文化翻译问题、跨语言翻译问题和与具体语篇相关问题”,而且认为跨文化翻译的问题是最难解决的,因为“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语言和非语言行为的习惯、规范和习俗”^[4]。

众多研究中语言学家卡特福德(Catford)的观点较有代表性。他认为“可译性的确似乎是一个连续体而不是一个明确的二分体……翻译等值关系取决于同一语境中原语和译语文本的互换性……取决于与语境实体相同的(至少是部分相同的)相互特征的关系”^{[5](P93)}。即当原语和目的语存在等值

关系:有共同特征的语境意义和语境实体,翻译等值关系的条件就越充分,译者就越容易“选择语境范围有最大重叠可能性的译语等值成分”^{[5](P58)}。他指出“如果不可能把功能上相关的语境特征建立在译语文本的语境意义之中,就无法进行翻译,或者说出现了不可译性”^{[5](P94)}。进而,他将不可译性分为语言的不可译和文化的不可译。

一、可译性和不可译性

人类生活在同一客观世界,在不断认识、改造和适应客观世界的同时形成了自己的认知、思维和文化,同时创造了自己的语言。因此作为人类,各民族的认知、思维和文化具有同一性或相似性,表达和承载其认知、思维和文化的语言间也具有同构性。所以整体而言,不同语言和文化间的交流是可能、可行的,其翻译也是可能的。这与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有类似之处。普遍语法的一个主要的涵义是第一语言与第二语言之间有很多的共性,尽管两者也有很多的不同之处。正是因为这种共性的存在,使得学习者在习得第二语言之前头脑中就有了所有语言共同的本质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是不需要去学的,是天生的。“可译性”包括三点:译者正确、精确理解原作蕴含的语言文化信息;译者用目标语确切地转换

* 本文为北京林业大学科技创新计划项目(BLRW200959)成果之一。

* 作者简介:张永萍,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及外语教学研究。

他/她理解的原作内容,译文的语言符合目的语的语言规范且尽力保持原语的形式风格。

然而,各民族由于具体生活环境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认知、思维和文化,这又使得不同语言在词汇、结构、语法等各方面表达具有差异。这些不同语言文化上的差异造成了语言和文化的难译和不可译。同质语言间翻译所面对的不可译性困难要小于异质语言间翻译,同样,同质文化间翻译所遇到的不可译性障碍也小于异质文化间翻译。

(一)语言的不可译

语言的不可译性(linguistic untranslatability)主要指译语没有与原语文本对应的形式特征。语言的不可译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原语中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汇或语法单位共用一个语言形式;原语单位一词多义而译语中没有相应的一次多义^{[5](P136-143)}。包惠南、包昂认为不可译的语言部分包括音律美感、字形结构、修辞手法、语言风格^[3]。田庆芳认为其主要指语音层、词汇层和语法层的不可译,具体表现形式包括:同形异义、同音异义、谐音双关、拆字游戏、谜语、连珠联、绕口令、押韵、对仗等^[6]。的确,将文化编码于其中的不同语言之间各有差异,尤其是异质语如英语和汉语间在语音、词汇、语法、修辞、意义等各方面差别更大,想用目的语原封不动地从内容和形式去解码或传真原语困难很大。英语属印欧语系,是拼音文字,偏重组合关系或句段,各种欧洲语言之间,聚合关系的相似性远远大于其差异性,它们有共同的形态学(morphology)和音位学(phonemics)就是相似性的证据,可以说他们属于同质语言。汉语属于汉藏语系。汉语是调位的(tonemic)、单音节的(mono-syllabic)、表意的(ideographic),涉及音、形、义,兼顾了声音语言和文字语言,涵盖了古汉语和现代汉语。所以,语言层面的翻译整体是可译的,但是涉及某一语言特有的一些音律、字形结构、修辞、风格等方面的翻译是难译或不可译的。

(二)文化的不可译性

文化的不可译性(cultural untranslatability)是因为“与原语文本功能相关的语境特征在译语文化中却不存在”^{[5](P136-143)}。纽马克(Newmark)说“我把文化定义为使用某种特有语言的群体所特有的生活方式及其表现形式”^[7]。由于各国家、各民族生活的客观地理环境、文化起源和其发展史等方面的不同进而造成了其各自的生活习惯、习俗、思维模式、价值观、审美标准、宗教等的差异,即不同的

文化模式和特征。尤其是一国一民族特有的而别国别民族没有的文化事物和现象翻译起来比较困难。虽然某一民族特有文化的翻译的确是困难的、有限度的,但就其整体而言,文化是可译的。正如刘传殊所说“所有的文化事物本身是可以被认知和表达的,因而在本质上是可译的。只是译语中一时缺乏相应的表达方式而已。因此,有文化差异造成的不可译只是一种暂时的不可译……。”^[2]暂时的不可译也可被称为难译。难译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观概念,承认翻译本质的可译性,这样可鼓励译者努力探索更好的翻译方法。

刘宓庆认为翻译中的可译性只能是相对的,绝对的可译性是不存在的。同理,翻译中的“忠”与“信”,也只能是相对的,绝对忠实于原文的译文也是不存在的^[8]。雅各布森(Jakobson)认为“任何认知的经验及其分类在任何存在的语言中都能表达。”^[9]他认为各种语言都有同等的表达能力。如果语言中出现词汇空缺,人们可以通过借词、借译、造新词、语义转移和迂回表达等方法对词语进行修饰和扩展。实际上,从翻译理论的角度出发,语言包括三种功能:认知表达功能、文化功能和美学功能。这三种功能造成了翻译从低、中到高的翻译难度。由于人类认知的普遍性和共性,语言的认知表达功能决定异语间整体内容的可译性;文化表达和承载功能决定翻译的相对可译性;语言的美学功能则是很难译或不可译的主要部分。

翻译中绝对的可译性和绝对的不可译性论断都有极端主义趋向。用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方式去区分翻译中的可译性和不可译也是不科学的。可译不可译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没有绝对的可译,也没有绝对的不可译,只不过是一个程度问题。绝大多数翻译都游走于可译和不可译之间。我们认为语言层面的翻译整体是可译的,但是由于不同语言音、词、结构、语法等方面的差异造成的一些音律、字形结构、修辞、风格等方面(如音律美、同形/同音异义、谐音双关、字谜、连珠联、绕口令、押韵、对仗、叠字等)的相对不可译现象在目前是很难改变的。文化层面的翻译是可译的,即使有些难译现象和暂时的不可译,也会随着翻译方法的不断探索更新和日益频繁的跨文化之间交流而变得易译和可译。

二、语言与文化,习语与文化

由于文化的复杂性,语言与文化二者的关系很难定义,但是人类很早就开始了这一领域的研

究,正如 Salzmänn(1993)所言:在人类学被公认为一门学科前人类早就开始研究语言和文化关系的性质了^{[10](P51)}。Humboldt(1767-1835)认为语言即精神,精神即语言,所以语言是人类精神的外在表现,很难找到比二者更等事物了^{[10](P151)}。语言在很大程度上根植于文化,反之亦然,语言是一种文化产品,同理文化也是一种语言产品^[11]。然而,Robinson(1997)的观点却稍有不同,就语言和文化的关系而言,语言的大部分内容包含于文化中,因此可以说一个社会的语言是其文化的一部分……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12]。邓炎昌、刘润清(1989)和 Robinson 的观点相似: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它映射着文化,文化影响并定型语言,就最广义的角度而言,语言是一个民族形象的再现,它包含着其历史文化背景、生活态度及生活方式^[13]。事实上,我们可以说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就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14]。特定的语言包含着特定民族的文化,一民族文化的形成、继承和发展有赖于其语言,正如王佐良所说:不了解语言中的文化,谁也无法真正掌握语言^[15]。

语言表达文化事实,使其具体化、形象化。其次,语言是通过文化才得以被习得、实现、传播和保存的。综合以上关于语言和文化关系的诸多讨论,就二者关系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语言是开启人类文化的工具,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是文化存在的形式,语言就是一种文化。

习语(idiom)是指“约定俗成的短语、结构或表达,其结构与一般语言结构不同,意义不同于其语言的字面义”(Webster's New World Dictionary of the American Language 2ed college edition 1972.)。朗文当代英语词典中,习语指“与组成其单个词语意义不同的短语”。广义而言,习语包括成语、谚语、俗语、惯用语和歇后语。^[16]百科全书般的习语是人类在几千年的生产和生活活动中总结和积累的思想文化结晶,也是语言中的精华部分。没有习语,语言将变得暗淡无光,正如英谚所述“proverbs are the lamps to words”(谚语为语言增光)。习语是语言中最生动、最活跃的部分,是“语言的核心与精华”^[17]。既然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密不可分,习语和文化要比其“母亲”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密切很多。根据语言的相对性原则,文化被编码在语言的词汇和句法中^[18],一个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体现在语言中。“从某种意义上说,习语作为某一社会集团文化历史观念的反映,最集中、最深刻地

体现出不同语言文化特征的全貌”^[19]。在解读英汉习语时仿佛在阅读英汉民族的历史和文化。

三、英汉习语的翻译

习语都有稳定的、固定的表达方式及变体,且都蕴含了丰富的民族文化。因此,翻译中“为习语找到最满意的对等物是最难的译事之一”,同时也“很难为内涵意义找到有效的接近的译文”^[20]。下面探讨了习语翻译的几种主要译法。

(一)替代

某些英汉习语有相同或相似的文化内涵、文化形象,给读者带来相同的情感意义,且有相同的语言表达形式,替代是最好的翻译方法。

(1)Bad news certainly travels swiftly. She had often heard in Charleston and Savannah that Atlanta people gossiped more and meddled in other people's business more than any other people in the south and now she believed it. (Margaret Mitchell, Gone with the Wind)

恶事传千里,果然如此。她以前在查尔斯顿和萨凡纳长听人说,在南方一带,要数亚特兰大人最爱饶舌,喜欢管别人的闲事,现在她真的相信了。(《乱世佳人》黄怀仁 朱攸若译)

汉语喜用具体数字表模糊概念如距离、长度等,谚语“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中的“千里”实际上是很远的意思。既然“千里”是个迷糊概念,英译文中没必要将千里译出,将其模糊化即可。在书面或口语中该汉谚语经常被部分使用“好事不出门”或“恶/坏事传千里”。这样一来,英谚语“Bad news certainly travels swiftly”和汉谚语“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中的后半部分从意义和语言形式上基本上完全重合,所以二者可直接替代。

(2)郑振海兜头一盆冷水泼来:“别以为红的绿的就好看,分穿在什么人身上。”(谶容《减去十岁》)

He at once poured cold water on her. “Don't imagine that gaudy colors are beautiful- it depends on who's wearing them.” (Tr. By Gladys Yang)

汉习语“泼冷水”或“冷水泼”(变体)和英习语“to pour/throw/dash cold water on”有着相同的意义(使某人泄气)和相同的语言表达形式(动宾结构),表明汉英民族在表达使人泄气或打击某人的积极性时有着同样的思维、使用了同样的形象“水”和“water”,且有着同样的语言表达习惯,因此完全可以采取简单的替代法来翻译该习语。

(二)直译

实际上,只有一小部分英汉习语在文化内涵和语言形式上完全对等。大部分因为其蕴含的独特民族文化或语言的表达差异很难做到这一点。此时,本着求同存异、彰显民族文化、丰富世界文化语言和“信”的原则应采取直译或异化翻译。正如纽马克(Newmark)所说“广义范畴内所有的翻译都必须是‘直译的’,也就是说,尽可能接近原文。狭义‘逐字逐词’范畴内,直译只能是找到可接受译文的初始技巧”^[21]。他在强调直译重要性的同时也提示译者避免逐字逐词的翻译或死译和极端直译主义。习语更是如此,因为习语的意义一般和组成它们的单个词或其组合意义完全不同。

(3)Some one else had said that: “Like must marry like or there’ll be no happiness.”Who was it?(Margaret Mitchell, *Gone with the Wind*) 有人也曾说过:“只有门当户对,龙凤相配,才会有幸福的婚姻。”这话是谁说的?(《乱世佳人》黄怀仁 朱攸若译)

英语谚语“Like must marry like”是“Like loves (attracts)each other”的变体,意思是包括性格、爱好、习惯、家庭背景等各方面有共同之处的人结婚比较般配,该谚语没有鲜明的文化内涵,只是英美民族总结的一条婚姻经验。但是汉语谚语“门当户对,龙凤相配”主要强调了男女的社会地位和外表必须般配;而且“龙”和“凤”蕴含鲜明民族文化形象,且在英汉文化中象征意义完全不同。汉语中“龙”是中华民族早期图腾,是种高贵、有超能力的的神物,中国皇帝常以真龙天子自居,龙还用来指高贵、有权威和能力、气宇轩昂的男子。“凤”是一种神鸟,象征和平、幸福和高贵,也用来指高贵、有修养的女子。“龙凤”合用特指男女婚姻结合。西方文化中龙(dragon)是种能喷火的可怕怪物,凤(phoenix)是种不死鸟,象征再生。所以例(3)中的译文既没有将原文中谚语的内涵信息完全转换过来,而且凭空加了两个易引起误解、有不同文化内涵的形象词。这种归化译法在此处是很不合适的。将该英语谚语译为“相像的人结婚才能成为好夫妻”更佳。

(4)大水啊!你这一去,是到老虎嘴里拔牙,可得多加小心,千万别有闪失。眼睛耳朵放灵动些,遇到紧要关头,可沉住气!

Ta-shui, this time you’re going into the tiger’s mouth to pull a tooth. You must be careful.

Whatever you do, don’t give yourself away. Keep your eyes and your ears sharp. If you get in a spot, control yourself. (Tr. By Sidney Sharpiro)

汉语习语“老虎嘴里拔牙”意指到非常危险的境地去完成一项艰巨的任务。形象词“老虎”在中英民族眼里都是一种非常凶猛的动物,要拔其牙齿是何等困难和危险。所以直译该习语不仅完全传递了其内涵意义,而且会引起英语读者同样的情感意义。

(三)补偿

翻译过程中,当遇到难以直接翻译的词句,译者往往需要借助译入语特有的语言表现手段,尽力弥补译文语言效果方面的缺损,以使译文达到与原文大体相同的效果,这种翻译过程就是补偿。威尔斯(Wilss)称其为解决语言内及语言外结构差异的手段,后者指文化上的不可译性,他也论述了词汇翻译的迂回策略,即解释性翻译,认为这是译者可以采用的唯一补偿手段^[22]。纽马克(Newmark)认为,补偿主要用于弥补译文在语义、声音效果、修辞及语用效果等方面的缺损^[23]。柯平认为变通和补偿手段包括加注、增益、视点转换、具体化、概略化、释义、归化和回译^[24]。马红军则将补偿手段划分为显性补偿和隐性补偿,前者指明确的注释(包括脚注、尾注、换位注、文内注以及译本前言、附录等);后者包括增益、具体化、释义、归化等手段,指译者充分利用各种译入语手段对原文加以调整^[25]。

1. 增译

(5)“三个臭皮匠,合成个诸葛亮”这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Three cobblers with their wits combined equal Chunkeh Liang the master mind.”In other words the masses have great creative power.

“诸葛亮”是中国古代一位智慧超人的历史人物,至今家喻户晓,现常用来指很聪明智慧的人。但是如直译英语读者会因没有这一汉语历史文化背景知识而迷惑不解。皮匠是聪明的巧手艺人,三个皮匠都比不了一个诸葛亮聪明,可见其超人之处。此译文在“Three cobblers”后加一定语“with their wits combined”,在“Chunkeh Liang”加同位语“the master mind”解释说明了二者的特征,补充了该习语的所有内涵意义,简明扼要。

2. 加注

(6)One swallow does not make a summer.

一燕不成夏。[注]语出《伊索寓言》。初夏时燕子大量地飞到英格兰。在此之前,个别燕子先行到达。因此不能看到一两只燕子就认为夏天已经来临。实际上此谚的含义是:一件证据不足以定案,克服了一个困难不能认为万事大吉;目前的舒适并不意味着今后永远安逸。《英汉双解英语谚语词典》

英民族对其天气、节气总结出经验:燕子的到来预示着夏天的到来。英国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燕子在初夏时大量迁徙至此。中国幅员辽阔,气候复杂,北方大体属温带大陆性气候,燕子在初春时大量地出现。如为节省力气和篇幅将该英语谚译为:一燕不成春,虽然其内涵意义已传递,但却不能让汉语读者了解英民族的不同的地理文化,更甚者向读者传递了错误信息:燕子也是在春天出现在英格兰的。

习语的翻译还有回译、直译加图示、音译创造新词加注法等。限于篇幅,就不在此举例示明了。

四、结论

奈达(Nida)认为译者的任务是“在目的语中重新产出一个首先在意义上、其次在形式上与原语最接近的自然对等物”^[26]。虽然“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或“One cannot eat his cake and have it”,但是在“达”基础上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与原文对等的译文无疑是最佳译文,这也是译者努力的目标。可译性使原文文本有传译的可能,不可译性使原文文本有传译的必要。“不可译的东西才真正值得一译”^[27]。译者要努力提升自己的语言和文化知识,克服困难,努力探索,借助求同存异、彰显文化和日益频繁交融的全球语言文化背景推进语言文化的可译性限度,使得更多难译、暂时不可译的语言文化向可译转化。

参考文献:

- [1]王宾.论不可译性—理论反思与个案分析[J].中国翻译,2001(3):8-15.
- [2]刘传殊.可译性的语言功能[J].中国翻译,2000(1):31-34.
- [3]包惠南,包昂.中国文化与汉英翻译[M].北京:外文出版社,2004:304-331.
- [4]Trosborg, Anna. Text Typology and Skills in Translator Behavior [M]. Amsterdam: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7: 59.
- [5]Catford, J.C. 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 [6]田庆芳.语言的不可译性和文化的不可译性比较[J].上

海翻译,2007(2):47-59.

- [7]Newmark, Peter.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94.
- [8]刘宓庆.文体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31,142.
- [9]Jakobson, Roman. 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 [A]. On Translation [C]. (ed. by Brower R.A.) Cambridge &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232-239.
- [10]Salzmann, Ingeborg. Language, Culture and Society: an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M]. San Francisco: Westview Press, 1993.
- [11]Wilss, Wolfram. Knowledge and Skills in Translator's Behavior [M]. Amsterdam: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5: 85.
- [12]Robinson, Douglas. Becoming a Translator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84.
- [13]邓炎昌,刘润清.语言与文化—英汉语言文化对比[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3.
- [14]宋永培,端木黎明.中国文化语言学辞典[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46.
- [15]刘先刚.文化翻译与语用学[J].山东外语教学,1989(4):51-54.
- [16]郁福敏,郭珊珊.英汉习语对比[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9:20.
- [17]穆雷.从接受理论看习语翻译中的文化差异的处理[J].中国翻译,1990(4):9-14.
- [18]Kramsch, Claire. Language and Culture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0:13.
- [19]杨永林.文化比较研究与翻译.中国翻译,1987(3):8-12.
- [20]Nida, Eugene A.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93: 37, 142.
- [21]Newmark, Peter.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M]. Oxford: Pergamon Press Ltd, 1981:138.
- [22]Wilss, Wolfram. 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 Problems and Methods [M]. Tübingen: Gunter Narr, 1982: 39, 104.
- [23]Newmark, Peter.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M]. New York: Prentice Hall, 1988: 88-91.
- [24]柯平.英汉与汉英翻译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09-110.
- [25]马红军.翻译补偿手段的分类与应用[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10):37-39.
- [26]Nida, E.A., Taber, C.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M]. Leiden, Netherlands: E.J. Brill, 1969:12.
- [27]Allen, Sture. Translation of Poetry and Poetic Prose: proceedings of Nobel Symposium 110 [C].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1999:17.